

企业政治战略、政治性社会资本 与政治资源获取

——政府俘获微观机理的实证分析

李健^{*}

【摘要】 作为转轨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政府俘获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课题。然而，学术界对政府俘获的微观机理一直缺少系统性研究，相应地，也始终无法说清楚究竟如何治理政府俘获。论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选择 EMBA 学员中企业高管人员为调研对象，观察 2008—2010 年 269 家企业的数据资料，对企业政治战略、政治性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①企业政治战略对构建政治性社会资本和获取政治资源都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同的政治战略影响程度存在差异；②企业政治战略对政治资源获取的作用是间接的，政治性社会资本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关键词】 政府俘获 企业政治战略 政治性社会资本 政策资源 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 F5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2486 (2013) 04 - 0108 - 22

^{*} 李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本文是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中政府俘获的定量检验章节所改写（李健，2012a）。作者感谢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宝教授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丁云龙教授给予的修改建议，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一、引言

中国三十多年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进程，一方面使政企关系逐渐由以往的隶属关系转变为更加市场化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完全主导经济的强势角色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使企业经营过程依然受到或明或暗的约束。在这种新型关系的重构中，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形成了多元化的交换关系。政府俘获是这种多元化交换关系的常见形式之一^①。政府俘获理论（State Capture Theory）兴起于20世纪末的东欧和拉美，它关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着重研究有权势的企业对公共政策制定规则的影响，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赵定涛、卢正刚，2005）。近年来，规制俘获、企业政治战略、社会资本等理论均被用以阐释企业对政府的负面影响。然而，这些研究由于受限于单一学科视角，不仅无法解释很多社会经济现象，也始终无法说清楚究竟如何治理政府俘获。比如，规制俘获理论研究侧重于从宏观层面考察政府俘获的制度起源和动力学，对其微观形成机理始终缺乏关注；企业政治战略理论将政府俘获视为政企之间的直接互动，忽略了双方所嵌入的关系网络及网络中其他参与人的影响；社会资本理论大多将社会资本作为企业的既有资源，却没有去分析这种资源是如何形成的。

基于以上理论空间，本文将政府俘获理解为企业采取政治战略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官员获取政治资源的过程，研究企业不同政治战略对政治资源获取的路径，并实证性地检验政治性社会资本在政府俘获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本文的另一个研究目的在于寻求并解释传统政府俘获理论与中国情景下研究发现的差异，以期为政府俘获治理提供决策和方法论支持。

^① 尽管对于我国是否存在政府俘获还存在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但不断涌现的证据表明：政府俘获在转轨时期的我国已经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它不仅存在于电力、电信和航空等传统自然垄断行业，而且已经广泛渗透到房地产、食品等竞争性领域，详见（胡鞍钢，2005；杨帆、卢周来，2010）。

二、理论假设与模型建构

（一）政治性社会资本与政策优惠

依据社会资本理论，企业在与政府的关系互动、情感交汇和合作行为中会形成富有生产性的关系，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通路（access）使企业具有了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大量经验研究表明，企业与政府官员及其关系网络成员建立社会资本不仅使企业避免了资产被侵占的可能，而且也是企业优先获得政府政策优惠的重要途径（Xin & Pearce, 1996；罗党论、唐清泉，2009；马富萍、李燕萍，2011）。一般而言，社会资本的研究维度分为外部视角、内部视角和自身特征三种，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性社会资本^①，相对于外部和内部视角而言，第三种研究视角更加适合，因此，我们依据那哈派特和戈绍尔（Nahapiet & Ghosal, 1997）的分类，从结构（STR）、关系（RE）和认知（CON）三个维度对政治性社会资本进行定量刻画。相应地，我们提出下列假设分析：

1. 政治性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与政治资源

政治性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结模式，具体包括网络联系、网络配置形式等等，政治性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网络联系可以从网络强度和网络规模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边燕杰（Bian, 1997）分析了强弱关系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差异，发现网络联系越强（强关系），就越容易获得来自实权人物的影响，李健（2012b）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与政府部门和官员之间所建立的网络联系越广泛，企业的政治绩效越高。网络配置形式方面，爱默生（Emerson, 1962）认为：网络中的权力分布是不平衡的，政企关系类似于权力－依赖关系，在网络结构中处于权力弱势地位

^① 边燕杰、丘海雄（2000）首先提出了纵向社会资本的概念，指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的联系，这种纵向联系的取向主要是向上的，目的是从“上边”获得和摄取稀缺资源；进一步地，邵挺（2011）提出了政治资本，马富萍、李燕萍（2011）提出了政治性社会资本等概念，都用于描述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网络联系而获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我们在此采用后者的提法，目的是与商业性社会资本和公共性社会资本相区分。

的企业可以采取“平衡性运作”改善其在网络中的地位,从而实现其结构自主性优势,而这种结构自主性会带来控制利益(Burt, 1995)。据此,提出假设1:

H1: 政治性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对企业获得的政治资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政治性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与政治资源

关系维度主要影响关系网络参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①,信任程度越高,彼此之间会减少投机行为(Bradach & Eccles, 1989; Gulati, 1995)。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信任和规范等良好的关系基础,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认为市场体制下,仅仅依靠价格机制的市场治理结构只能提供短期经济激励,但无法提供通过合作改善长期战略地位的激励和有效控制风险与机会主义行为,企业不得不谋求与政府之间的“制度性信任”模式作为非正式交换机制。卡勒等(Kale et al., 2000)认为,基于信任和交互作用的关系资本有助于联盟成员更好地进行资源交换和共享,并克服内部冲突,进而成为企业政治资源获取的重要途径。据此,提出假设2:

H2: 政治性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对企业获得的政治资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政治性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与政治资源

认知维度指关系网络中个体对客观世界看法的一致性,在认知一致性的基础上,网络成员可以进行充分的沟通,并进一步促进网络成员对资源的获取(Tsai & Ghosal, 1998)。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他们也并不总是“大公无私”的,同样存在着对自身私利的追求(Shleifer & Vishny, 1994),企业与政府具有相似的价值观更易于建立“认知共同体”,从而实现双方资源和信息的共享(Golightly et al., 1972)。进一步地,李玲(Li, 2011)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将利益交换与社会交换嫁接,在缩小政府官员同企业之间距离感的同时保持政府官员的心理优势,避免认知失调给其带来的不适,从而促成双方交易的实现。据此,提出假设3:

H3: 政治性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对企业获得的政治资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① 那哈派特和构绍尔(Nahapiet & Ghosal, 1998)将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分为信任、规范、责任和可识别的身份四个方面,基于政治性社会资本的具体情形,本文从信任角度进行分析。

（二）企业政治战略与政治性社会资本

企业政治战略是指企业寻求有利于自身公共政策结果的行为（Keim & Baysinger, 1988）。相对于短期的、遇到麻烦时求人办事所发生的企业政治行为，企业政治战略更加着眼于长期的社会资本积累而非耗散（张建军、张志学，2005）。希尔曼等（Hillman et al., 1995）将公共政策过程描述为“需求方”（企业）和“供给方”（政府）的关系，认为企业政治战略将会有利于需求方与供给方信任关系的形成与发展，降低交易的边际成本，而由于信任关系的存续，双方会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从而提升各自的社会资本。叶广宇、冯惠平（2007）认为企业积极主动地配合政府的执政活动、做政府鼓励的事情以及投入固定的资源和精力都可以建立与改善政企关系。目前关于企业政治战略有很多分类方法，为了简化分析，我们根据希尔曼和希特（Hillman & Hitt, 1999）的研究，将企业政治战略划分为信息策略（Information strategy, INF）、财务刺激策略（Financial strategy, FIN）和政绩支持策略（Political strategy, POL）三种，相应地，我们提出下列假设分析：

1. 企业信息策略与政治性社会资本

企业会通过为政府提供特殊的信息来影响政策以寻求偏好和优惠，这种信息常常包括了对不同方案成本收益的结果的分析（Aplin & Hegarty, 1980）。信息策略通常包括内部代理人或外部专家的游说、调研报告、调式研究、参与座谈会或听证会、向政府提交技术性报告或论文等。米勒（Miller, 1996）认为，由于规制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信息不对称，规制者在立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产业集团为其提供信息，而一些企业可以借此机会成为政府的信息来源，并建立同政府的联系。在公共关系学的相关研究中，企业游说等策略也被视为企业与政府建立联系的重要手段（布鲁姆等，2002：25）。因此，提出假设：

H4a：企业信息策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b：企业信息策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c：企业信息策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企业财务刺激策略与政治性社会资本

企业财务刺激策略也被称为“吸收”策略，即企业通过雇佣或提供给官员

或代理人直接的财务刺激将外部政治环境吸收到企业内部（Ring et al. 1990）。财务刺激策略包括向政府官员及其关系网络成员提供贿赂政府、赠送礼物、雇佣任职、邀请参加活动或发表演讲、支付差旅费以及其他私人服务等。寻租理论认为，官僚为了选举或金钱主动“创租”，诱使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获取这种垄断租金的条件。很多西方国家文献研究也认为中国的政企关系是在企业向政府官员及其亲信提供财务刺激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通常与官员腐败行为相互交织（Morton & Charles, 1992; Smeltzer & Jennings, 1998）。因此，提出假设：

H5a：企业财务刺激策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b：企业财务刺激策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c：企业财务刺激策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企业政绩支持策略与政治性社会资本

企业政绩支持策略是指企业将自己的经营活动与政府部门政绩及个人偏好、意愿等联系起来，增加企业与政府的关联性，包括成为政府骄傲和依赖的企业，雇佣下岗员工兼并亏损企业，积极进行慈善捐款，积极建党支部、工会等，投资兴建标志工程等有利于政府官员政绩的行为。田志龙等（2003）认为这种策略主要是为了建立与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短期或长期的联系。周黎安（2004）认为政府官员“锦标赛”机制使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进而转向与提供政绩支持企业的合谋。因此，提出假设：

H6a：企业政绩支持策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b：企业政绩支持策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c：企业政绩支持策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论文通过问卷调查面向国内各高校 EMBA 学员中来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采

集数据,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首先,根据赫尔曼、考夫曼(2003)的研究,政府俘获程度并不必然是参与俘获的企业数量的函数,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单独一个强大的垄断企业所可能造成的俘获程度要比许多力量稍差的企业所造成的政府俘获程度高的多,EMBA学员所在企业更符合俘获者企业的特征,可以使调查更有针对性,减少工作量,这些学员多为企业中的高层管理者,他们对企业内部的信息了解也更为全面;其次,在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相对多数EMBA学员愿意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并认真填写调查问卷,从而可以保证数据质量。在实证研究中,笔者先用SPSS19.0软件对调查问卷信度和效度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对我国企业政治战略、政治性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源类型进行衡量;再运用软件AMOS17.0对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所表示的结构方程进行求解和验证。

(二) 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

笔者在2011年4-7月和9-12月分两次进行全国性调研采集数据。在样本选择方面,笔者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17所开设EMBA教育中心的高校面向在读学员发放问卷,其中一部分问卷采取电话采访的方式进行。实际发放问卷500份,回收313份,得到有效问卷26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53.8%。有关样本的基本资料见表1。

表1 企业样本的总体概况

所有制分布			企业成立年限			规模分布		
类型	样本数	比重%	类型	样本数	比重%	规模	样本数	比重%
国有	97	36	<1	51	19.1	大型	34	12.6
民营	128	47.5	1<Y<3	65	36.3	中型	131	48.8
外资	44	16.4	Y>3	123	44.6	小型	104	38.6
地理分布			地理分布			行业分布		
省份	样本数	比重%	省份	样本数	比重%	行业	样本数	比重%
北京	7	2.5	山东	12	4.5	机械制造	33	12.1
天津	8	3.1	河南	12	4.6	能源石化	13	4.9
河北	10	3.6	湖北	7	2.7	纺织化纤	11	4.2

(续上表)

地理分布			地理分布			行业分布		
山西	9	3.4	湖南	10	3.6	金融保险	27	9.9
辽宁	10	3.6	广东	12	4.6	农林牧渔	10	3.7
吉林	7	2.5	广西	9	3.4	金属矿业	18	6.7
黑龙江	13	4.9	四川	14	5.1	食品饮料	8	3.1
内蒙古	8	3.0	重庆	11	4.2	医药卫生	14	5.2
上海	6	2.2	贵州	10	3.6	交通运输	8	3.1
江苏	12	4.3	云南	10	3.6	建筑水利	7	2.7
浙江	9	3.4	陕西	12	4.5	房地产业	21	7.8
安徽	10	3.7	甘肃	7	2.8	IT 电信	37	13.9
福建	10	3.6	海南	11	4.0	服务业	20	7.6
江西	11	4.0				商业贸易	15	5.7

注：由于不同行业企业规模的划分标准不一致，本文采用了《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暂行）》（国统字〔2003〕17号）和《部分非工企业大中小型划分补充标准（草案）》以从业人员数、销售额和资产总额三项指标结合行业类型来衡量企业规模。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须同时满足各项条件的下限指标，否则下划一档。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变量设置

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包括企业政治战略、政治性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源等。这些变量大多难以量化测定。赫尔曼等人（Hellman et al., 2000）的研究表明，尽管可能存在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会导致测量结果的变异性，但就目前来看，感知测量依然是对政府俘获进行测度的有效方法。因此，本研究对变量的测度采取李克特五级量表。要求调查对象对变量进行估计，数字1~5依次表示很差（很少）、较差（较少）、一般（中等）、较好（较多）、很好（很多）。

1. 解释变量

本研究选择企业政治战略作为解释变量，结合有关文献的研究，每种政治战略又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战术组成，我们将信息策略（INF）设置为企业向政府及政府官员游说（inf1）、通过行业协会提供信息（inf2）、通过专家向政府建言

(inf3)、向政府部门提供技术性研究报告或文件 (inf4) 共 4 个题项; 财务刺激策略 (FIN) 设置为企业向政府官员及其关系网络成员提供贿赂 (fin1)、赠送礼物 (fin2)、邀请参与活动 (fin3)、赞助旅游 (fin4) 以及提供其他个人服务 (fin5) 等 5 个题项; 政绩支持策略 (POL) 设置为企业做政府鼓励的事情 (如雇佣下岗职工) (pol1)、成为政府骄傲和依赖的单位 (pol2)、做政府推荐的事情 (如兼并亏损企业) (pol3)、有利于政府政绩的投资 (如投资当地的标志工程) (pol4) 和适合政治环境的事情 (如积极从事党建工作等) (pol5) 共 5 个题项。

2. 被解释变量

在本研究中, 政治资源为被解释变量。由于相关研究多强调多指标测度政治资源的重要性, 我们从政府俘获的定义出发, 将企业所获得的政策优惠 (Preferential policy, PRE) 作为政治资源, 并采用多维度指标进行综合衡量, 以解决定量刻画的难题。斯蒂特勒 (Stigler, 1971) 认为, 一个企业俘获政府主要是为了固定价格 (fixed-price), 进入控制和政府补贴, 而安德森和褚思曼 (Anderson & Tushman, 1990) 认为, 企业俘获政府还有可能是为了影响标准的制订。司里连科等 (Slinko et al., 2005) 认为企业俘获政府所获得的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税收减免、投资信贷、补贴、担保贷款、延迟纳税、许可证颁发、无偿政府财产担保以及开放经济领域 (open economic zone) 进入等。结合上述研究, 我们将政策优惠的范围定义为融资便利、放松进入规制、固定价格、标准降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六个领域, 这些领域可以基本囊括企业获取政治资源的主要目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企业所获得的政策优惠可能有一些是国家区域和产业政策而非企业政治战略所导致的结果, 忽略这一差异可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对此, 司里连科等 (Slinko et al., 2005) 认为可以用企业所受到政策优惠的集中性 (在一定时间内企业相对于同行业其他企业享受了更多的优惠政策) 和持续性 (企业相对于同行业其他企业长时间享受优惠政策) 作为判定标准, 我们在研究中遵循了这一思路, 区别在于他利用了俄罗斯地方政策数据库中的客观数据, 而本文采用主观测度法要求被访企业回答在 2008—2010 年相比行业内其他企业, 在融资便利、放松进入规制、价格固定、标准降

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六个领域享受的政策优惠程度。

3. 中介变量

论文将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作为中介变量,这些变量会对政治资源产生影响,其中结构维度包括企业与政府官员及其关系网络成员联系的频繁程度、密切程度和联系数量3个题项,关系维度包括机会主义倾向性、真诚合作的程度、信守承诺的程度衡量3个题项,认知维度包括企业与政府官员有效沟通的程度和企业与政府价值取向的相似程度2个题项。利恩德斯和盖贝(Leenders & Gabbay, 1999)认为,社会资本是企业在与外部环境主体在交往中逐渐形成的,社会资本所带来的收益同样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在对其进行衡量时要考虑到基于短期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的有效性问题的。由于企业政治战略与其所获得的政治资源之间也是非同步的,有时甚至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的观测数据,研究中采用了折中办法,即均测度社会资本过去三年的平均情况。

4. 控制变量

对于涉及企业自身相关特征(例如企业规模、所有制和成立年限等)的相关变量是否会对政治资源结果产生影响尚存在争论(Hellman et al., 2003; Peng & Luo, 2007; Li & zhang, 2007; Acquaah, 2007)。我们在研究中将这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企业规模方面,以从业人数、销售额和资产总额三项指标为依据,小、中、大企业取值为0, 0.5和1。在企业成立年限方面,以企业从创立至今的时间跨度为依据,成立1年以内的初创企业、1-3年内的企业和3年以上的企业取值分别为0, 0.5和1,在所有制方面,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取值为0, 0.5和1。

(四) 信度与效度检验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运算之前,需要对数据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问卷信度一般用Cronbach's α 系数来衡量。一般而言,保留的变量对所有题项的相关系数大于0.35,并且测度变量的Cronbach's α 系数大于0.7才能满足信度的要求;效度方面包括表面效度和建构效度。问卷设计方面,我们首先通

过文献回顾和对企业高管的经验调查和访谈形成初级的调查量纲；然后召开项目讨论会广泛征求意见，对问题进行修改和完善；在进行调查之前，我们又通过预测试对题项进行纯化，最终确定问卷。如此，可以保证问卷具有较高的表面效度。对于建构效度，一般采用因子分析进行检验，如果同一层面因子载荷值超过 0.5 则表明区别效度越高。同时，结合 KMO 检验与 Bartlett 球度检验来测量各个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一般而言，KMO 值越接近于 1，表明越适合做因子分析。从检验结果来看，以上变量设置能够满足信度和效度的需要。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与相关性分析

运用相关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模型设定的合理性，表 2 给出了本研究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 Pearson 相关系数。

表 2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 Pearson 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INF	FIN	POL	STR	RE	CON	PRE
INF	2.9010	1.08425	1						
FIN	3.9540	0.95562	0.449 **	1					
POL	3.1233	1.06110	0.358 **	0.262 **	1				
STR	2.9458	0.94723	0.441 **	0.587 *	0.338 **	1			
RE	3.2102	0.95747	0.504 **	0.181 *	0.345 **	0.337 **	1		
CON	2.7547	0.91364	0.315 **	0.336 *	0.208 **	0.731 **	0.750 **	1	
PRE	3.19778	1.29222	0.522 **	0.212 *	0.342 **	0.425 *	0.766 *	0.762 **	1

注：** $p < 0.01$ ，* $p < 0.05$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描述性统计来看，信息策略、财务刺激策略和政绩支持策略的均值都在 2.90 以上，表明这三种策略都为企业所广泛采用，但从出现的频次来看，财务刺激策略是最主要的手段，其次是政绩支持策略，信息策略出现最少，略低于中等水平；在社会资本方面，关系维度最高，其次是认知维度和结构维度，表

明相互信任在双方交易实现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企业获得的政治资源介于一般和较高之间，说明调研对象所在的企业享受到的政府集中性和持续性的政策优惠比行业平均水平要高。从 Pearson 相关系数来看，企业政治战略的信息策略、财务策略和政绩策略，政治性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政策优惠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的合理性。由于控制变量可能会对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产生影响，进一步地，我们分别将企业规模、成立年限和所有制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对企业政治战略和政治资源做偏相关分析，发现在剔除这些变量后，各个变量之间仍然显著正相关，但 Pearson 相关系数大于偏相关系数，说明控制变量对模型输出结果存在一定影响，但依然可以判定，剔除这些影响因素之后，企业政治战略与政治资源、政治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源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二）假设检验

由于获取政治资源的企业政治战略和政治性社会资本所涉及的变量之间关系比较复杂，不适合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因此，选择结构方程建模工具来验证我们所预设的概念模型，本研究采用 AMOS17.0 软件来实现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过程。

首先设定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1。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主要变量设置为：采用 14 个外生显变量（inf1、inf 2、inf 3、inf 4、fin 1、fin 2、fin 3、fin 4、fin5、pol1、pol 2、pol 3、pol 4、pol 5）来对 3 个外生潜变量（INF—信息策略、FIN—财务刺激策略、POL—政绩支持策略）进行测量，采用 14 个内生显变量（str1、str2、str3、con1、con2、re1、re2、re3、pre1、pre2、pre3、pre4、pre5、pre6）对 4 个内生潜变量（STR—结构维度、RE—关系维度、CON—认知维度、PRE—政治资源）进行测量。与此同时，考虑到模型计算结果可能产生误差会导致模型拟合程度差的问题，我们又引入了包括 28 个显变量（e1 ~ e28）的残余变量和 4 个潜变量的残差变量（u1 ~ u4），默认路径系数为 1。由此该模型一共包括 12 条初始假设路径，这些假设可以帮助我们检验企业政治战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源获取的影响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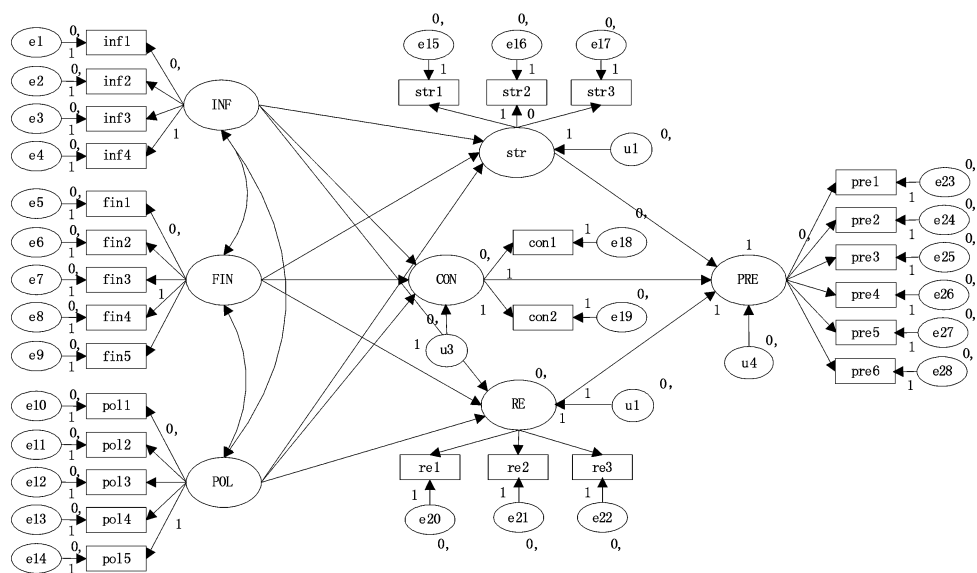


图1 初始结构方程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初始模型的拟合结果为，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值为 1.845，小于所建议的参考值 2。同时，该初始模型的 RMSEA 值为 0.041，小于建议的参考值 0.08，SRMR 小于 0.08，NNFI 和 CFI 均大于 0.900。因此，各项参数值的结果都处于所建议的参考值区间，模拟的拟合程度较好，初步验证了初始理论模型是成立的，各变量之间的确存在可研究的结构性关系。然而，表 3 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初始路径统计检验中存在 λ_{11} 、 λ_{23} 和 λ_{31}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3 初始模型路径参数估计结果

路径标识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路径系数	C. R.	P
λ_{11}	STR←INF	0.176	0.133	1.349	0.172
λ_{12}	STR←FIN	0.509	0.465	5.285	0.000
λ_{13}	STR←POL	0.355	0.233	3.422	0.000
λ_{21}	RE←INF	0.168	0.148	2.074	0.035
λ_{22}	RE←FIN	0.294	0.294	3.056	0.003
λ_{23}	RE←POL	0.163	0.126	1.190	0.223
λ_{31}	CON←INF	-0.123	-0.175	-0.744	0.471

(续上表)

路径标识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路径系数	C. R.	P
λ_{32}	CON←FIN	0.742	0.668	6.955	0.000
λ_{33}	CON←POL	0.226	0.149	2.048	0.047
β_{11}	PRE←STR	0.457	0.659	4.586	0.000
β_{12}	PRE←RE	0.186	0.214	2.597	0.000
β_{13}	PRE←CON	0.421	0.633	4.156	0.00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进一步地,我们发现路径 λ_{31} 不仅路径系数未通过验证,而且C. R. 值也距离拟合参考标准值要求较远。因此将路径 λ_{31} 删除,再次导入数据进行AMOS拟合运算。拟合结果表明,初始模型拟合的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值为1.717,比初始模型略有降低。同时,该初始模型的RMSEA值为0.047,小于建议的参考值0.08,SRMR也略有减少,NNFI和CFI有所提高,且更接近于1。因此,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程度相比初始模型有所提高,说明该模型可以接受。

表4显示了修正模型的路径参数估计结果,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所有路径的C. R. 值都大于1.96的参考值,并且除 λ_{31} (CON←INF)以外,其他假设的p值都小于0.05的临界值,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其他路径描述的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样本数据支持其他假设。

表4 修正模型路径参数估计结果

假设	路径标识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路径系数	C. R.	P	结论
H4a	λ_{11}	STR←INF	0.092	0.067	2.278	0.033	支持
H5a	λ_{12}	STR←FIN	0.542	0.475	5.432	0.000	支持
H6a	λ_{13}	STR←POL	0.343	0.221	3.305	0.002	支持
H4b	λ_{21}	RE←INF	0.255	0.172	2.164	0.021	支持
H5b	λ_{22}	RE←FIN	0.230	0.215	2.662	0.009	支持
H6b	λ_{23}	RE←POL	0.216	0.143	1.973	0.037	支持
H5c	λ_{32}	CON←FIN	0.717	0.713	7.909	0.000	支持
H6c	λ_{33}	CON←POL	0.196	0.164	2.156	0.036	支持
H1	β_{11}	PRE←STR	0.404	0.621	4.663	0.000	支持
H2	β_{12}	PRE←RE	0.157	0.248	2.546	0.027	支持
H3	β_{13}	PRE←CON	0.434	0.649	4.063	0.000	支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参数检验后,还要进行路径效应分解,通过比较潜变量的相互作用,为以便更为全面清晰地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为进一步解释提出的理论假设奠定基础。表5显示了修正确认模型中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统计显著性关系。其中,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表5 路径效应分解

	INF	FIN	POL	STR	RE	CON	PRE
总效应							
STR	0.087	0.543	0.343	0.000	0.000	0.000	0.000
RE	0.108	0.759	0.212	0.000	0.000	0.000	0.000
CON	0.000	0.762	0.316	0.000	0.000	0.000	0.000
PRE	0.176	0.551	0.308	0.407	0.363	0.421	0.000
直接效应							
STR	0.087	0.543	0.343	0.000	0.000	0.000	0.000
RE	0.108	0.759	0.212	0.000	0.000	0.000	0.000
CON	0.000	0.762	0.316	0.000	0.000	0.000	0.000
PRE	0.000	0.000	0.000	0.407	0.363	0.421	0.000
间接效应							
STR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CON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RE	0.176	0.551	0.308	0.000	0.000	0.000	0.00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

(一) 研究结论

目前针对政府俘获的研究日益丰富,但对于其背后所隐藏的交易模式,我们依然知之甚少。本文通过对企业政治战略的细分和量化并引入多维度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政府俘获的微观机理,并对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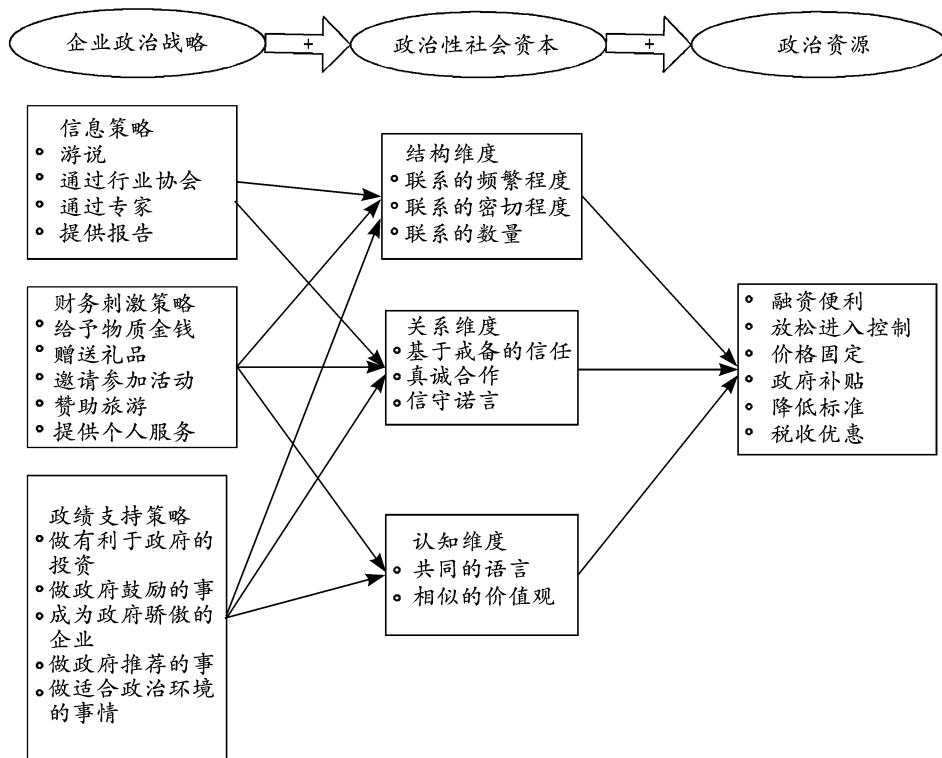


图2 研究得出的概念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了更好地理解模型结果，下面围绕理论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一些重要关系作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1. 不同的企业政治战略类型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差异

基于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我们发现财务刺激策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度最大，其次是政绩支持策略，这表明目前中国的政企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非制度化的手段在实现对政府官员物质和晋升双重激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显著的边缘化特征。信息策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假设 H4c 未通过。并且，信息策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结构和关系维度影响力度也比较弱，分别为 0.087 和 0.108。一般而言，信息策略对认知维度起到促进作用，出现这一反“常识”的结论有其特定的情景。在当前立法过程并不透明的情况下，受近年来生乳、电动车国标等热点事件的影响，企业

通过向政府建言影响公共政策的做法往往会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①，这不仅造成企业使用信息策略的成本急剧上升，更可能弱化这一策略的使用效果，政府出于顾忌而不愿意采纳，但又不能明说，从而导致信息策略对认知维度没有产生作用。相比信息支持策略，财务刺激策略和政绩支持策略因其私密性较高，更容易被企业优先采用。

2. 不同的企业政治战略类型对政治资源获取的影响存在差异

基于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识别出企业不同的政治战略对政治资源获取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企业不同的政治战略对企业政治资源获取均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的力度不同。其中，财务刺激策略对企业政治资源获取效应最大（0.551），政绩支持策略其次（0.308），最后是信息支持策略（0.176）。这与卡珀斯和吉凡诺尼（Campos & Giovannoni, 2007）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他们认为即使在不发达国家，游说和政治捐献也比行政贿赂更加有效。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我国企业的财务刺激策略在特殊的社会关系文化情景下已经成为人情关系下的一种“礼物”，它与“行贿”的区别不在于交换是否有工具性动机，而在于它把发展和保持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获得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3. 政治性社会资本在政府俘获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从表5的效应分解中不难看出，企业政治战略的三个特征分别对政治性社会资本三个维度的直接效应等于总效应，间接效应为0；同时，企业政治战略特征对政治资源获取的作用是间接而非直接的，两者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这说明企业政治战略通过政治性社会资本间接影响公共政策获取的作用机理。其具体作用路径为：企业通过政治战略建立和改善企业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建立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和规范，并在频繁的互动中共享语言和价值观，从而使企业具有了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我们的研究结论没有支持张建军、张志学（2005）关于

^① 通俗地讲，塔西佗陷阱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企业政治战略的目标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的观点，但实证支持了温德索（Windsor，2007）提出的企业政治战略链模型（political strategy chain），即“政治策略购买关系—政企关系购买影响力—影响力购买产出”，说明了“社会资本在‘准现代’的社会—即以组织失灵与正式组织腐败为特征的社会里是特别的。个体可以求助于涉及到非正式、弥散的社会关系网络—乞求或哄骗公共事务官员，利用熟人放宽规定，或者违规”。此外，研究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在转轨时期的我国，企业通过正式途径影响公共政策的成本可能十分昂贵，借助中国特色的“熟人”文化情景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这一成本，而社会资本进一步将政企之间的互动转化为一个无限循环往复的过程，放大了政府俘获的“社会排斥”效应。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俘获的微观机理包括企业政治战略对政治性社会资本的作用路径与社会资本对政治资源获取的作用路径，企业政治战略对政治资源获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投资”政治性社会资本所实现的。如此，不仅弥补了企业政治战略理论缺乏“嵌入性”考量的遗憾，亦可避免社会资本理论抹杀社会资本来源的不足，同时还从微观视角有效地丰富了政府俘获的形成机理，有效拓展了政府俘获理论的研究空间。

社会资本并不等同于寻租或腐败行为，但研究发现中国的“关系”文化情景被政企双方共同利用，进而成为政府俘获形成的关键要素。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关系”是不能在短期内改变的，对抗俘获最直接的需要并不是要改变社会公众的价值观与态度，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建立法律和正式制度结构进行约束，而是要将“关系”转入公共领域。为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改变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方式，减少造成寻租机会的公共政策数量；其次是完善政企沟通的制度化渠道，降低企业反映合法化诉求的成本；最后加强对公共政策影响评估。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作为一项本土情景下的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①区别

◆ 论文

于多数研究将社会资本视为既有资源的做法,本文假设多数企业的政治性社会资本是企业“投资”的结果,尽管更符合现实,却有可能忽略一些企业“天然”的政治关联;②变量测量的主观性。本研究中对相关变量的测量均采用了主观感知法,虽然这种方法多为前人所使用,并且也经过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主观判断法仍可能影响数据乃至结论的准确性,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设计相对客观的指标来测量变量,有助于提高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 边燕杰、丘海雄(2000).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2.
- 胡鞍钢(2005).中国3G世纪报告(研究报告).北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 格伦·布鲁姆、艾伦·森特、斯科特·卡特里普(2002).有效的公共关系.北京:华夏出版社.
- 李健(2012a).中国转轨时期政府俘获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健(2012b).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有效性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11.
- 罗党论、唐清泉(2009).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7.
- 乔尔·赫尔曼、丹尼尔·考夫曼(2003).解决转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比较(5),北京:中信出版社.
- 马富萍、李燕萍(2011).资源型企业高管社会资本、资源获取与技术创新.经济管理,33(8).
- 邵挺(2011).政治资本、企业评级与政企纽带.南方经济,13.
- 田志龙、高勇强、卫武(2003).中国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研究.管理世界,12.
- 杨帆、卢周来(2010).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决策——以房地产利益集团为例.管理世界,6.
- 叶广宇、冯惠平(2007).关系型企业政治战略方法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2.
- 赵定涛、卢正刚(2005).转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05,2(2).

- 张建君、张志学 (2005).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管理世界, 7.
- 周黎安 (2004).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 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经济研究, 6.
- Acquaah, M. (2007). Managerial Social Capital,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 An Emerging Econom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8 (12): 1235 – 1255.
- Anderson, P. & Tushman, M. L. (1990). Technological Discontinuities and Dominant Design: a Cyclical Model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5 (4): 604 – 633.
- Aplin, J., & Hegarty, H. (1980). Political Influenc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Organizations to Impact Legislation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 Matte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3 (3): 438 – 450.
- Bian, Y. (1997). 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3): 366 – 385.
- Bradach, J. L. & Eccles, R. G. (1989). Markets Versus Hierarchies: From Ideal Types to Plural Form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 97 – 118.
- Burt, S. R. (1995).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pos, N. F. & Giovannoni, F. (2007). Lobbying,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Public Choice*, 131 (1 – 2): 1 – 21.
- Emerson, R. M. (1962). Power2dependence Re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 (2): 31 – 41.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6): 1360 – 1380.
- Golightly, C. D. & Luo, H. (1972). Liking and Longing.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56: 521 – 523.
- Gulati, R. (1995). Does familiarity breed Trust? The Implications of Repeated Ties For Contractual Choice in Allian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 (1): 85 – 112.
- Hellman J. S., Jones, G. & Kaufmann, D (2003). 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 (4): 751 – 773.
- Hillman A. J, Keim, D. & Schuler, D. (2004).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a Review and

-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30 (6): 837 – 857.
- Hillman, A. J. & Michael, A. H. (1999).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Formulation: A Model of Approach, Participation, and Strategy Decision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 (4): 825 – 842.
- Leenders, R. T. & Gabbay, A. J. (1999).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nd Liability*. Boston: Kluwer.
- Li. H. & Zhang, Y. (2007). The Role of Managers' Political Networking and Functional Experience i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8 (8): 791 – 804.
- Li, L. (2011). Performing Bribery in China-Guanxi-Practice, Corruption with a Human Fa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 (68): 1 – 20.
- Kale, P. , Singh, H. & Perlmutter, H. (2000). Learning and Protection of Proprietary assets in strategic alliances: building relational capital.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 217 – 237.
- Keim, G. , & Baysinger, B. (1988). The Efficacy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14 (2): 163 – 180.
- Miller, C. (1996). Demographics and Spending for Public Education: Test of Interest Group Influenc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15 (2): 175 – 185.
- Morton, R. & Charles, C. (1992). Elections and the theory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Firm Subsidies and the Byrd Amendment. *Economics and Politics*, 4 (1): 79 – 108.
- Nahapiet, J. , & Ghoshal, S. (1998).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 (2): 242 – 266.
- Peng M W. & Luo Y. (2000).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 (3): 486 – 501.
- Ring. P. , Lenway S. A. & Govekar, M. (1990). Management of the Political Imperativ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1 (2): 141 – 151.
- Shleifer A. , & Vishny, R. W. (2002). *The Grabbing Hand: Government Pathologies and Their Cur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linko I. Yakovlev, E. , & Zhuravskaya, E (2005). Laws For Sale: Evidence from Russia.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 Review*, 7 (1): 284 – 318.

- Smeltzer, L. R. & Jennings, M. M. (1998). Why An International Code of Business Ethics Would Be Good for Busines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7 (1): 57 – 66.
- Stigler, G. J. (197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2 (1): 3 – 21.
- Tsai, W. & Ghoshal, S.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 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1 (4): 464 – 476.
- Xin, K. R. & Pearce, J. L. (1996). Guanxi: 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s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9 (6): 1641 – 1658.
- Windsor, D. (2007). Toward A Global Theory of Cross-Border and Multilevel Corporate Activity. *Business & Society*, 46 (2): 253 – 278.